

西汉帝陵陪葬墓的分布及相关问题*

刘尊志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山东 济南市 250100)

关键词: 西汉帝陵; 陪葬墓; 位置与分布; 陵园变化

摘要: 陪葬墓是西汉帝陵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 多数帝陵的外陵园内有数量不等、位置不同的陪葬墓。通过研究发现, 帝陵陪葬墓在具体分布内容、整体分布特点及发展等方面具有阶段性特征。受相关制度、设施及政治内容等影响, 陪葬墓的分布不仅反映出帝陵陪葬墓的有关内容与内涵, 亦较好地体现出与之相关的陵区规划和陪葬制度等。陪葬墓分布由集中于帝陵一侧发展为多侧皆有, 并在西汉晚期形成以南侧为主的分布特点, 其与中陵园的发展综合反映出外陵园主体由东部向南部的转变, 较好地促成了西汉帝陵在西汉末年完成由坐西面东向坐北面南的转变, 并成为东汉帝陵坐北面南的重要继承因素。

Keywords: Western Han imperial mausoleums; accompanying tombs; 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evolution of mausoleum complexes

Abstract: Accompanying tombs constituted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Western Han imperial mausoleums. The outermost precincts of most imperial mausoleums contain varying numbers of such accompanying tombs in diverse loc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hased evolution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verall patte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accompanying tombs of imperial mausoleums. Influenced by releva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infrastructural limitations,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distribution of accompanying tombs reflects not only the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ccompanying tombs themselves, but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broader planning of mausoleum complexes and systems regulating the arrangement of accompanying burials. The distribution of accompanying tombs evolved from a concentrated arrangement on one side of the imperial mausoleum to a more dispersed pattern on multiple sides.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the accompanying tombs were predominantly built on the south side,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precinct of the imperial mausoleum, reflecting a shift in the main part of the outermost precinct from east to south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the reorientation of Western Han imperial mausoleums from an eastward-oriented plan to a southward-oriented one by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The reorientation was a key factor in the carrying on of the southward-oriented layout of Eastern Han imperial mausoleums.

西汉是古代陵寝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与帝陵陵寝相关的组成要素较为丰富多样, 陪葬墓作为要素之一, 体现出与帝陵陪葬制度相关的较多内容。关于西汉帝陵陪葬墓的分布, 《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1]《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2]等文探讨了西汉帝陵陪葬墓区的设置、陪葬墓的等级差异、陪葬者身份及陪葬墓园的性质等问题, 指出帝陵与

陪葬墓象征着汉王朝与地方侯国、邑、郡之间的密切关系, 体现出西汉帝陵模仿现实中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试就西汉帝陵陪葬墓分布及相关问题作浅显分析。不当之处, 以求指正。

一、考古发现概况

据相关研究, 西汉帝陵实行独立陵园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实证研究”(项目编号: 25&ZD048)阶段性研究成果。

制度，并存在内、中、外三重陵园，内、中陵园较为规整，有园墙或围沟，外陵园一般随自然地形而呈现出不规则状，无园墙或围沟。天子、皇后、嫔妃和大臣等按等级埋葬于不同层次的陵园中，体现出与现实社会森严等级相吻合的陵墓埋藏系统^[3]。亦有研究指出，一般所述帝陵外陵园（即上述中陵园）的园墙或围沟之内具有“陪葬”性质的墓葬称为祔葬墓较合适，陪葬墓则位于该重陵园的园墙或围沟之外^[4]。综合上述观点，以三重陵园为参考，本文所述帝陵陪葬墓，是指位于外陵园之内、中陵园的园墙或围沟之外，具有陪葬性质的墓葬。需作说明的是，一些帝陵的刑徒或修陵人墓葬、与陵邑有关的墓葬，在广义上均属于帝陵陪葬墓，但与中陵园外规划的主陪葬区的陪葬墓存在不同，故下文除专门分析外基本不作叙述。

（一）长陵

长陵陪葬墓基本位于长陵东部的今徐家寨至费家新庄一带，南至高干渠附近，东到费家新庄的东部，北至泾阳费家新庄西北的台地边缘，西到西史村与东史村之间。徐家寨至费家新庄之间的陪葬墓分布最为密集，东西成行、南北成列，南北达十几排。墓葬以东向、南向居多，也有个别为北向，不见西向者^[5]。近年来经考古钻探，在长陵西侧也发现一定数量“陪葬墓”，因详细资料未公布，加之具有其他性质的可能，本文基本不涉及。

（二）安陵

安陵陪葬墓基本分布于安陵东部的今跃进村至狼家沟一带，墓葬以东向居多，南向者次之，西向者较少，未发现北向者^[6]。

（三）霸陵

霸陵外陵园中发现两处大型汉代墓葬区。一处位于江村大墓西北3000米处的马家沟村附近，共有汉墓7座，整体呈东西向排列，偏西侧5座为东北向，偏东侧2座为西南

向；另一处位于江村大墓西南约3900米处的栗家村附近的白鹿原西侧二级台地，发现汉墓20余座，其中4座规模较大，皆东南向^[7]。

（四）阳陵

阳陵陪葬墓主要位于阳陵东部约1100米处，总面积约3.5平方千米，以东司马门道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陪葬墓大部分有墓园，多以壕沟分隔，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已探明各类墓葬5000余座，时代从景帝年间一直延续至东汉中期，距离东司马门道近者，墓园规模大，壕沟宽而深^[8]。另外，中陵园北园墙外的北司马门道东西两侧各有1座规模较大的墓葬^[9]。（图一）

（五）茂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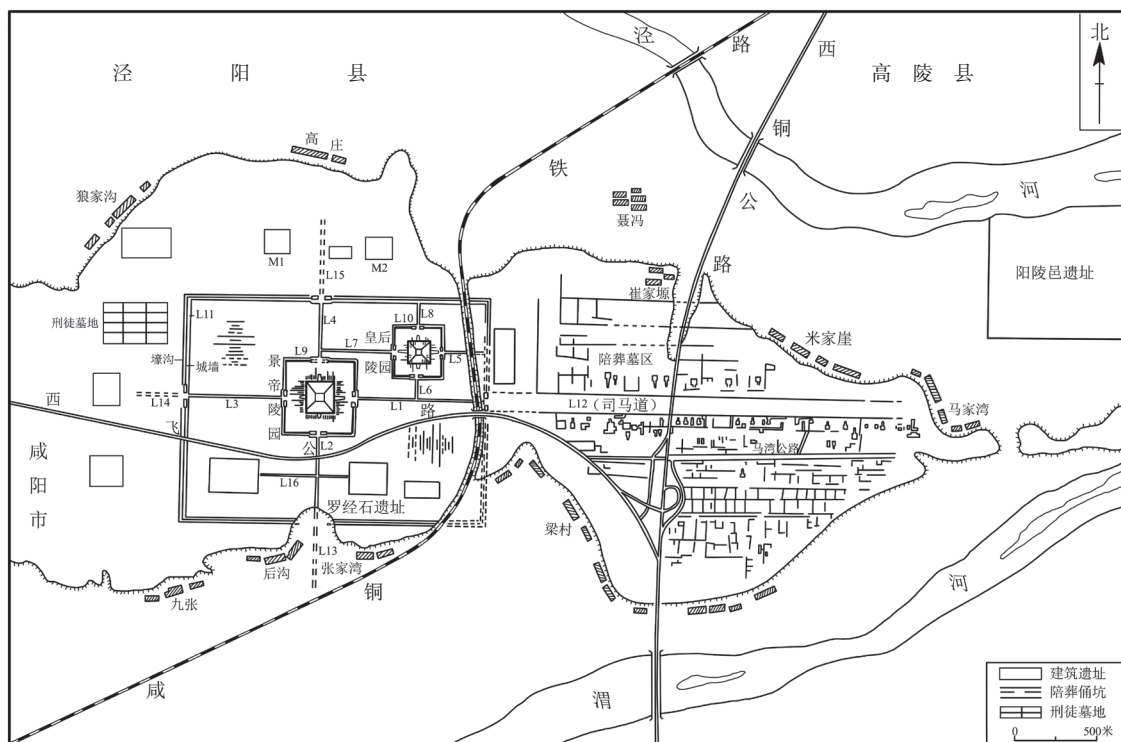
茂陵中陵园的园墙外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皆有一定数量的西汉墓，东侧较为集中。就大、中型墓葬来讲，东侧发现26座、南侧发现8座、西侧发现12座，北侧仅发现5座，部分有独立墓园，其中东侧陪葬墓中有“卫青墓”“霍去病墓”“霍光墓”“上官桀墓”“金日磾墓”及“阳信冢”等^[10]。

（六）平陵

平陵东侧的上帝王村西部和北部经钻探调查发现9座墓葬，其中7座墓道朝东，2座朝南，排列比较整齐，可以确定为平陵陪葬墓。平陵北部的平陵邑西部、大王村西北部，零星分布数十座墓葬，大多两三个一组，墓道以东向为主，可能有平陵的陪葬墓。平陵西部、小寨村南部发现6座墓葬，有的墓道朝东，可能为陪葬墓。（图二）平陵南姜家村至苏家寨的二道塬上曾有57个冢，亦可能有平陵的陪葬墓^[11]。

（七）杜陵

杜陵外陵园内东部、东北部及北部发现75座陪葬墓，有的墓葬外环绕围沟或夯墙，有的墓旁原应配祠堂类建筑，墓向四个方向都有^[12]。



图一 阳陵陵区平面图
(改绘自《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图一)

(八) 渭陵

渭陵外陵园的西南部和东南部有较多陪葬墓，西北部数量较少，东北部和西部极少或没有。陪葬墓大多几座一组聚在一起，规律不明显。墓道朝向并不统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均有，南向居多^[13]。(图三)

(九) 延陵

延陵外陵园经调查、勘探发现36座陪葬墓，南司马门道两侧最为集中，东司马门道、西司马门道两侧相对较少。墓葬以南向、东向者居多，部分墓葬有夯土墓园，或有门阙，有的墓葬可能有祠堂等与祭祀相关的建筑^[14]。东距平陵4000多米的黄家寨—西石村墓群，原被认为是平陵的陪葬墓，但根据最新钻探资料，基本确定属于延陵的陪葬墓^[15]。

(一〇) 义陵

义陵外陵园内的东部与南部分布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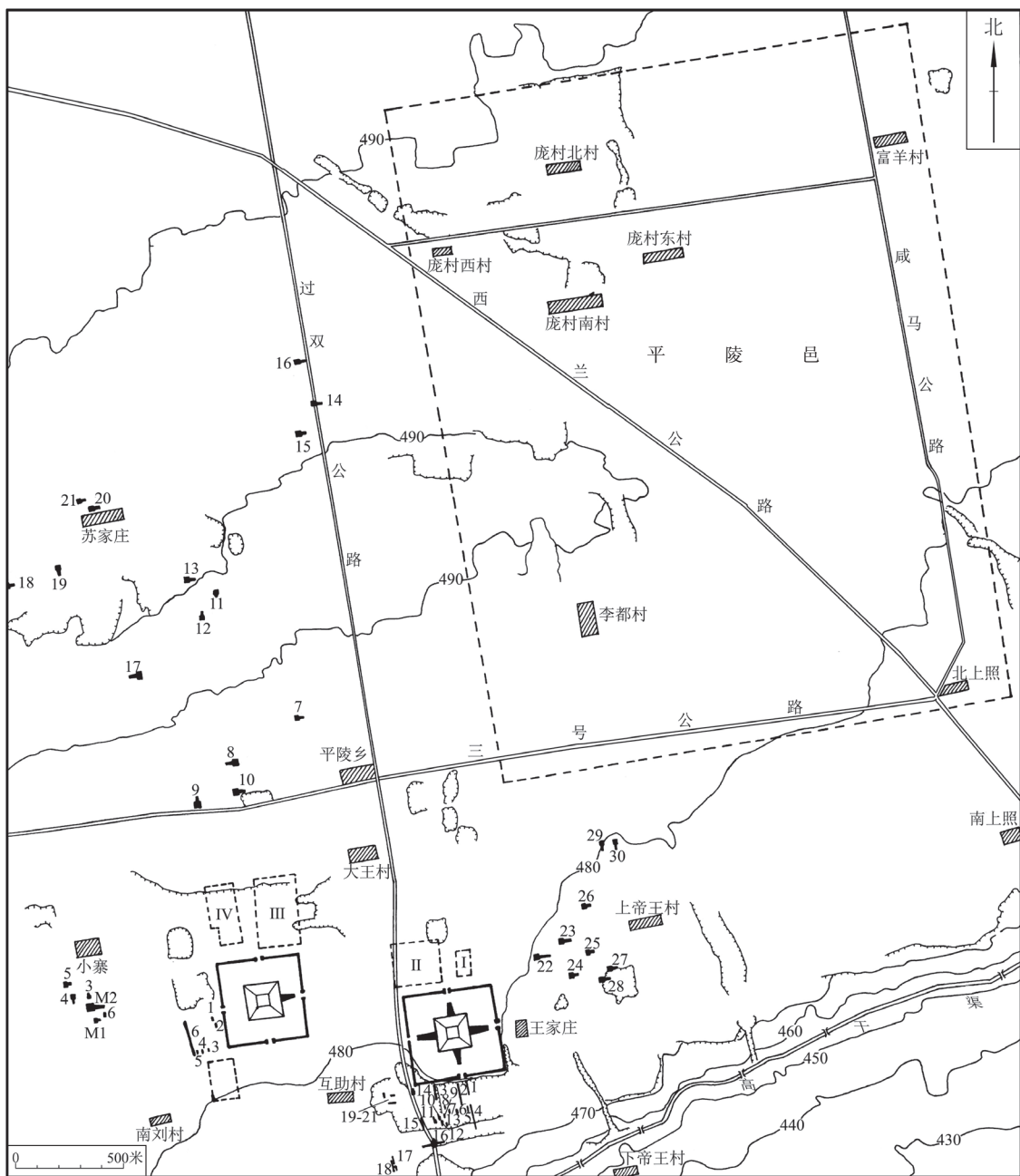
数量的陪葬墓，调查勘探发现16座，南侧12座、东侧4座，墓向四个方向均有^[16]。

二、陪葬墓的位置与分布

西汉时期，在继承前代墓葬制度基础上，等级相对较高的墓葬大多会有一定数量的陪葬墓。帝陵等级最高，陪葬墓不仅是其陵区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陵寝制度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西汉帝陵外陵园面积较大且形状不一，有足够空间安置陪葬墓。陪葬墓在外陵园的分布方位，可以反映出陪葬墓的分布情况与发展变化等。

(一) 陪葬墓的方位

《西汉十一陵》一书指出，西汉帝陵的大多数陪葬墓分布在帝陵以东，也有有的在帝陵以北^[17]。结合目前考古发现可知，西汉一代，陪葬墓在帝陵中陵园外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皆有分布，而不同帝陵陪葬墓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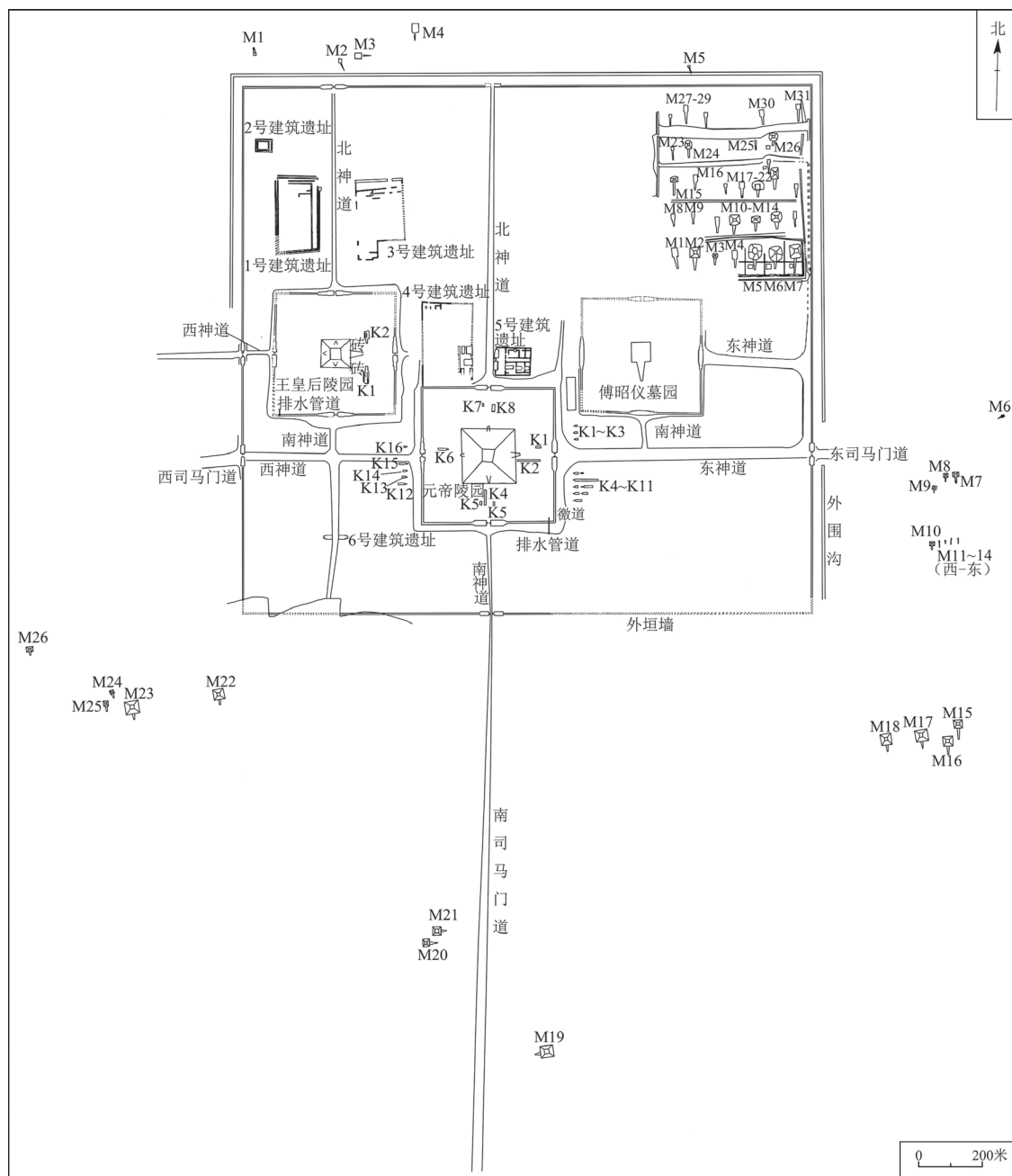
图二 平陵陵区平面图

(改绘自《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图四五)

布的具体方位存在一定相似和差异，不同方位的陪葬墓数量也存在差别，体现出陪葬墓在分布方位的主次之分。（表一）

据现有资料，高祖长陵、惠帝安陵与文帝霸陵基本是在中陵园外一侧有陪葬墓，陪葬墓数量较多，是相对集中的体现。时代

较早的长陵、安陵仅在东侧有陪葬墓，霸陵则仅在西侧有陪葬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帝陵具体方位的变化有关。由于相关原因，文帝未葬在都城长安北咸阳原，而是葬于都城东南，其陵墓与咸阳原上的长陵、安陵遥相对应，而霸陵陪葬墓在位置方面也对长陵



图三 渭陵区平面图
(改绘自《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图五)

与安陵有所继承和借鉴。霸陵西侧安置陪葬墓，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长陵、安陵陪葬墓分布方位的翻转，形成反向对称的分布特征。整体来看，长陵、安陵、霸陵的陪葬墓位置与分布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和相对较强的一致性集中性。

阳陵中陵园外，除北侧有2座规模较大的陪葬墓，余皆位于东侧。既说明阳陵与长陵、安陵、霸陵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又反映出陪葬墓不再局限分布于帝陵一侧的初步发展特征，这也是帝陵陵区规划发展变化的体现，阳陵之后的帝陵基本不见陪葬墓仅分布

表一 西汉帝陵中陵园外主要陪葬墓分布方位及相关内容

西汉帝陵	中陵园外陪葬墓分布方位	数量多少与疏密程度
长陵	东侧（仅一侧）	数量多，较密集
安陵	东侧（仅一侧）	数量多，较密集
霸陵	西侧（仅一侧）	数量略少，相对密集
阳陵	东、北侧（两侧）	东侧数量多，较密集；北侧仅2座，较稀疏
茂陵	东、南、西、北侧（四侧）	东侧数量多，较密集；另三侧数量少，相对稀疏
平陵	可能东、南、西、北均有（四侧）	东侧数量略多，较密集；另三侧数量少，相对稀疏
杜陵	东、北侧（两侧）	北侧数量多，较密集；东侧数量少，较稀疏
渭陵	东、北、南侧（三侧）	南侧数量略多，较密集；另两侧数量少，较稀疏
延陵	东、西、南侧（三侧）	南侧数量多，较密集；另两侧数量少，较稀疏
义陵	东、南侧（两侧）	南侧数量多，东侧数量少，皆相对稀疏

在一侧的情况即是证明。

茂陵与平陵的中陵园外四侧皆有陪葬墓，对前代帝陵陪葬墓分布方位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同时还是皇权至尊性及中央集权制度扩大和加强的有效体现，茂陵的陵区较大即与此对应，而平陵则对茂陵有所继承。可以看出，中陵园外两侧、三侧甚至四侧有陪葬墓者，每一侧的陪葬墓数量不等，进而形成相应的组合。

上述帝陵中，部分帝陵陪葬墓仅在一侧集中分布，而陪葬墓分布在二至四侧的，也基本是其中一侧为主要的集中分布区。文帝霸陵由于特殊因素，陪葬墓分布于中陵园外西侧，其他帝陵则体现出陪葬墓在中陵园外东侧分布最为集中的特征，推测应与帝陵基本东向有关，并反映出时代稍晚帝陵对时代略早帝陵在陪葬墓分布方面的继承和延续。

杜陵亦位于都城的东南方向，中陵园外东侧虽有一些陪葬墓，但北侧陪葬墓的数量更多、更集中。杜陵陪葬墓的分布位置与阳陵相似，但二者不同方位的陪葬墓疏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再结合其与茂陵、平陵陪葬墓分布的异同来看，这种情况明显不同于霸陵的位置翻转及反向对称，更多体现为创新

内容。这不仅是帝陵朝向方位（东侧）的陪葬墓减少与衰落的体现，也是帝陵侧方位陪葬墓数量逐渐增多的开端。

位于咸阳原的渭陵、延陵和义陵基本参照杜陵，但陪葬墓的分布以中陵园外南侧居多，再次体现出位置翻转及反向对称的特征。渭陵的西北侧、延陵的西侧也有少量陪葬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相应的发展，而义陵的东侧虽有陪葬墓，但明显较少，南侧则成为陪葬墓分布的主体。康陵目前暂未发现陪葬墓，或因王朝衰落，加之部分工程可能是在王莽时期续建^[18]，或原本未有陪葬墓的情况亦在情理之中。

（二）陪葬墓与所在方位司马门道的位置关系

长陵与安陵，陪葬墓主要位于东司马门道北侧，呈东西横长、南北延伸的密集分布状态，南侧零星分布。霸陵与阳陵，主要陪葬墓分别位于西、东司马门道两侧，霸陵西司马门道两侧陪葬墓还体现出北多南少的分布特征。阳陵北司马门道两侧各有1座陪葬墓，但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的陪葬墓则分布密集、排列有序，说明陪葬墓在帝陵一侧集中分布的现象已趋于稳定。

茂陵与平陵，四个司马门道旁侧皆有陪葬墓，茂陵东司马门道两侧的陪葬墓分布相对密集且排列较为有序，平陵则是东司马门道北侧的陪葬墓数量较多。两座帝陵其他三侧的陪葬墓在密集程度和有序排列方面均逊于东侧，且平陵陪葬墓存在分布于司马门道一侧的情况。杜陵北司马门道东侧陪葬墓的数量较多，且向北延伸距离长，为陪葬墓分布区的主体，但相对稀疏；东司马门道两侧也有陪葬墓，南侧分布相对密集，北侧则略少，且东西延伸距离短，整体数量不多。

渭陵东司马门道南侧及南司马门道两侧稍远距离的陪葬墓数量较多，东司马门道北侧与北司马门道西侧略少。延陵南司马门道两侧陪葬墓数量最多，东司马门道南侧及西司马门道两侧也有一些陪葬墓。义陵南司马门道两侧的陪葬墓数量较多，东司马门道两侧数量少。这三座帝陵均体现出南司马门道两侧为陪葬墓主体分布区的特征，而其他方位的陪葬墓不仅数量少，分布范围亦较小。就主体分布区域的陪葬墓而言，又体现出较明显的相对稀疏特征，这或与杜陵的影响有关，也可能与王朝的衰落、陪葬帝陵的人员趋于减少存在联系，故在大面积陪葬茕域中，陪葬墓却呈现出相对稀疏的分布状态，文献中亦有相应记载。根据记载，成帝刘骜在营建昌陵时，“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19]，修建过程中即赐予不同人员冢地，可能与增加帝陵陪葬人员有关。另外，这些帝陵处于西汉晚期阶段，随着新莽代汉及东汉王朝的建立，后世陪葬者减少或者没有，也可能是陪葬墓稀疏的原因之一。

由上可知，司马门道两侧或一侧有陪葬墓的现象皆较为多见，并体现出主体陪葬墓区的位置逐渐由东司马门道旁侧转向南司马门道旁侧的发展和变化。而在南司马门道旁

侧成为陪葬墓主要分布区的同时，帝陵东、西司马门道的南侧大多会有一些数量的陪葬墓，北侧则较少或没有，体现出陪葬墓分布在发展过程中的集中和趋同。

（三）陪葬墓分布的四个阶段

根据上文分析，可将西汉帝陵陪葬墓的分布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长陵至阳陵，除阳陵北侧有2座陪葬墓外，陪葬墓分布基本以帝陵一侧为主，东司马门道一侧或两侧者居多，陪葬墓数量多且集中。霸陵存在相似的反向对称情况。其中长陵与安陵为偏前阶段，霸陵与阳陵属偏后阶段。

第二阶段为茂陵与平陵，陪葬墓位于帝陵四侧，东司马门道两侧数量多且分布集中，其他三个方位数量相对较少，或集中，或分散。

第三阶段为杜陵至义陵，陪葬墓位于帝陵的两侧或三侧，其中以南侧或北侧（较多为南侧）的陪葬墓数量多且分布相对密集，其他方位的数量少，局部密集，但整体分散。

第四阶段为康陵，因王朝衰落等政治、经济原因，可能无陪葬墓。

概括而言，西汉帝陵陪葬墓的位置与分布特征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并体现出较明显的时代特点，而这又与西汉帝陵的整体发展较为一致，可视为西汉帝陵及其陵寝制度发展的组成内容之一。

三、影响陪葬墓分布的有关因素

西汉帝陵陪葬墓的分布与发展受到相关制度，帝陵的配套设施及营建时代，甚至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陪葬墓位置的有关制度

西汉帝陵的三重陵园中，中陵园的园墙或围沟之内为帝陵核心所在，其中包括帝、后陵

墓及其他较多设施，还有数量不等的祔葬墓，构成与皇室宫廷密切相关的埋葬空间。中陵园园墙或围沟之外的外陵园则属另一空间，其内墓葬的性质不同于中陵园内祔葬墓。

据记载，乐安侯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墻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20]。据相关研究，帝陵四侧到中陵园门阙处即至司马门之间的道路为“神道”，司马门以外横贯陪葬墓园的道路称为“司马门道”或许更为贴切^[21]。李蔡盗取神道外的一亩地并计划葬于此，当是违反了与祔葬和陪葬有关的礼仪与制度。作为大臣的李蔡，被赐冢地应在外陵园的相应位置，为二十亩，由此可知外陵园中规划的陪葬墓区面积很大，一些大臣被赐的冢地也有相应面积。李蔡在被赐冢地后又盗取三顷卖后牟利，说明有的陪葬冢地还被私下进行买卖，而这可能也是李蔡被治罪的原因之一。不过根据记载内容，李蔡“盗取神道外墻地一亩葬其中”应是其被治罪的主要原因，按罪当下狱，而其也因此自杀。该事例说明，祔葬墓与陪葬墓在陵区规划中各有位置、区分明确，并存在严格规定，而且这些应是帝陵陪葬制度内容之一。

相关研究指出分布于外陵园司马门道两侧的墓葬可以叫作陪葬墓，而且很多陪葬墓对称排列于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呈朝列参拜状^[22]。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外陵园内与对应帝陵有关的墓葬基本都可视作陪葬墓。如阳陵西北约1.5千米处的刑徒墓地，墓葬集中但排列无序^[23]，茂陵中陵园西围墙西约3.8千米处的修陵人墓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为大量排列密集的小型墓葬。二者位置偏僻，墓葬等级较低，为汉陵修建过程中的客观产物^[24]。陵邑是西汉帝陵的组成内容之一，与之对应也有一定数量的墓葬，但较多分布

于陵邑外侧，与帝陵距离较远，虽有部分等级稍高，但大多等级较低，而且还有一些瓮棺葬或儿童墓。陵邑墓葬在位置、性质等方面明显区别于距离中陵园相对较近、规划相对明确的陪葬墓，但也间接与帝陵形成了陪葬关系。从广义方面讲，这些墓葬也是陪葬墓，也能体现出与整个陵区规划有关的内容。亦可能有祔葬墓位于外陵园司马门道旁侧，如阳陵北侧2座规模较大墓葬，其中1座（M2）若是景帝栗姬的墓葬^[25]，当为祔葬墓。此墓位于北司马门道旁侧，一方面可能与早期祔葬制度尚未完善有关。另一方面，该处墓葬数量少、位置独立，也暗示其可能存在特殊原因。不过，这2座墓葬更可能是具有特殊性质的陪葬墓。上述三类墓葬的性质与中陵园外主要规划陪葬区中陪葬墓的性质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体现出西汉帝陵针对不同性质陪葬墓在空间位置、分布格局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综上可知，陪葬墓位于帝陵外陵园中当存在相应的制度要求，且陪葬墓的性质具有多样性，其分布和位置的多种体现也与此有关。

（二）帝陵及陵邑的相关变化

长陵至阳陵整体反映出东向为尊的特点，因此陪葬墓主要分布在中陵园外东侧、东司马门道旁侧。长陵、安陵的陵邑位于帝陵北部，陪葬墓则以东司马门道北侧数量多且集中，体现出位置同侧的特点。阳陵邑位于帝陵东北较远距离，中陵园与陵邑之间较大的空间足以安置陪葬墓，陪葬墓与中陵园园墙的距离也稍近一些，而帝陵北侧也有空间可以安排相关陪葬墓。

茂陵在保留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为主体陪葬墓区的前提下，受阳陵北司马门道两侧设置陪葬墓的影响，外陵园中陪葬墓的位置及分布方面更趋多样化，而这也是西汉王朝繁荣发展、皇权至尊性提高及中央集权制

度加强的充分体现。茂陵邑位于陵区的东北部，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西与中陵园东墙间隔不足400米，而且南邻东司马门道，使得东司马门道北侧陪葬墓的分布出现隔断。部分陪葬墓位于中陵园东墙与陵邑西界之间，呈南北向分布，南侧靠近东司马道，数量多且密集，北侧数量较少；另有部分陪葬墓则位于陵邑外东南侧。平陵邑位于中陵园外北偏东位置，呈南北向长方形，而帝陵位于中陵园内偏东南，则陵邑南侧有较大的空间，从而东司马门道旁陪葬墓多位于北侧，体现出同侧靠近的特点。陵邑的西边靠近北司马门道，二者之间空间较狭窄，致使中陵园外北侧陪葬墓基本分布于北司马门道的西侧。

杜陵位于都城的东南，陵邑位于中陵园外西侧偏北位置，南北距离较长，且主体陪葬墓位于北侧，可能受到陵邑的影响，陪葬墓基本位于帝陵北司马门道的东侧，呈南北长距离延伸的分布状态。虽然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仍分布一些陪葬墓，但陪葬墓的主体位置在北司马门道东侧。渭陵的南司马门道较其他司马门道要长很多，且帝陵在中陵园中的位置为居中偏南，此皆表明南侧在外陵园中的重要性得到很大提升。渭陵中陵园外西北较近位置及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少有陪葬墓，南侧则有较多陪葬墓，当是杜陵陪葬墓的位置翻转与反向对称。

渭陵及其后西汉帝陵的考古勘探暂未发现陵邑，推测渭陵及之后，陵区的组成要素中很可能减省了陵邑^[26]，而陵邑对于帝陵陪葬墓位置和分布的影响也逐渐消失。

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其他影响西汉帝陵陪葬墓分布与变化的原因。如自元帝时期始，西汉王朝逐渐处于外戚专权的背景之下，对中陵园内附葬墓重视程度的提高，亦是造成外陵园中陪葬墓减少及分布稀疏的原因之一，至少相关现象的形成较为同步。限

于篇幅，有关原因不再一一分析。正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构成了帝陵陪葬墓分布内容的多样性，并较好地反映出相应的发展与变化。

四、陪葬墓分布与中陵园的关系

西汉一代，帝陵陪葬墓的位置、分布与中陵园之间存在着相应关联，并与上述四个阶段相对应，综合反映出帝陵陪葬内容、内涵的发展变化及对应陵寝内容的演进。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长陵的中陵园为南北向长方形，安陵的中陵园则为东西向长方形，但其长宽比例均略小。长陵或对秦始皇帝陵南北向陵园有所继承，但亦有出于自身需求的变化，如根据汉初经济情况缩小陵园规模，形成长宽比例较小的南北向长方形中陵园，结合陵园东门、东司马门道的重要性及帝后陵墓东向等内容，综合体现出陵园东向为尊的特点。安陵则在长陵基础上有所变化。两处帝陵的陪葬墓与中陵园的距离略远，以东司马门道北侧为主，并与中陵园平面形状相结合，体现出君臣有别、臣子朝列参拜等内容，这亦为其后帝陵陪葬墓的位置、分布等奠定了相应基础。

霸陵的外陵园内，陪葬墓与中陵园亦有稍远距离，体现出继承的内容，中陵园为东西向长方形，长宽比接近1.4:1^[27]，而陪葬墓在中陵园较窄一侧分布较集中，且西司马门道两侧皆有一定数量的陪葬墓，这些变化体现创新的同时也标志着新特征开始形成。由于霸陵位于都城东南，又反映出继承基础上的位置翻转及反向对称。阳陵中陵园为东西向长方形，长宽比略大于1.4:1，新变化是北司马门道两侧安置陪葬墓，但主体陪葬墓集中分布于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则是继承霸陵基础上的位置翻转、反向对称与进一步发展。随着王朝统治的日渐稳固和发展，西

汉帝陵开始形成自身的特点，霸陵与阳陵的东西向长方形中陵园可能对当时长安城的主体形状有所摹写，而中陵园东西距离的相对变长，加之陵区其他设施的设置，一定程度上或可促使陪葬墓与中陵园的距离趋近。参考陪葬墓集中分布的情况，还有帝陵东向的特征，使得政治内容如中央与地方、朝廷与臣僚的关系等得到更好体现，而陪葬墓的位置、分布与中陵园之间的关系更趋一致化。

茂陵与平陵中陵园的平面形状及东司马门道旁侧为陪葬墓主要分布区等特征是对前代帝陵的继承，其中茂陵中陵园的东西长与南北宽之比略大于 $1.4:1$ 。较之前代帝陵，最大不同是中陵园外四个方位皆有陪葬墓，且一些陪葬墓靠近中陵园的园墙。可以看出，在保留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为主体陪葬墓区的前提下，外陵园中陪葬墓的分布位置更趋多样化，这是西汉王朝繁荣发展、皇权至尊性提高及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的充分体现。

与霸陵相似，杜陵也具有一定特殊性，陪葬墓分布在继承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多新内容。中陵园的东西长与南北宽之比略小于 $1.25:1$ ，陪葬墓紧邻园墙或围沟，虽然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仍有一些陪葬墓，但主体移至北司马门道旁侧。因杜陵在长安城东南，陪葬墓整体反映出向都的特征。而杜陵最突出的改变是陪葬墓在中陵园较宽一侧分布较集中，这对其后一些帝陵有较大影响。

渭陵、延陵和义陵的陪葬墓均以中陵园外南侧为主要分布区，与中陵园的距离大多较近，部分为贴近。渭陵中陵园的东西长与南北宽之比为 $1.125:1$ ，其外西北较近位置及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有少量陪葬墓，南侧有数量较多的陪葬墓，因陵区在都城西北，当是继承杜陵陪葬墓的位置翻转与反向对称，而渭陵的南司马门道较其他司马门道要长很多，结合中陵园内帝陵位置为居中偏南，表明南侧位置在外

陵园中的重要性得到很大提升。

延陵的中陵园西北内凹，东南外凸，因后陵陵园西迁，其可能是变通后的新格局。排除内凹和外凸部分，中陵园的东西长与南北宽之比约为 $1.186:1$ 。帝陵陵园南移及主体陪葬墓位于南司马道东西两侧则是对渭陵的延续^[28]，这样不仅突显了帝陵在陵园内的重要性，也进一步稳固了南侧位置在外陵园中的主体性。义陵的中陵园东西长与南北宽之比约为 $1.2:1$ ，帝陵位置靠南，主体陪葬墓位于南侧。

上述四处帝陵的中陵园东西长与南北宽之比有所差异，但基本在 $1.125:1\sim 1.25:1$ 的范围内，相差不大，均接近方形，而帝陵的位置南移，陪葬墓也随之以南侧分布为主体，向都特征较为突出，整体反映出南侧已逐渐成为外陵园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不同于平陵及之前帝陵的一项转变，预示着西汉晚期帝陵形制的某种变化^[29]。

平帝康陵中陵园的东西与南北长度之比约为 $0.83:1$ ，且仅在中陵园南侧开一门，虽然帝陵位置居中偏西，但陵园整体已明显体现出坐北面南的特征，这是针对坐西面东制度的一大转变。南侧较为开敞为陵园特征之一，或许有地形、地势的原因，但更多是陵园内容变化的结果。

可以看出，陪葬墓的位置和分布与中陵园之间存在一定关系。陪葬墓与中陵园的园墙或围沟之间的距离呈现出由远到近的发展趋势，甚至出现紧邻与贴近的情况，这也是陪葬墓分布的发展内容之一。中陵园的东西与南北长度之比分别体现出继承创新与转变内容，如平面形状从接近方形、到东西长南北短、再到杜陵之后长宽比例变小，直至最后长宽位置的转变，陪葬墓的位置及分布的疏密程度也随之有所发展和变化。根据上文，中陵园最迟在安陵时有了新变化，霸陵

时中陵园平面形成东西窄长的特征，一直延续至平陵阶段，杜陵及之后则是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直至康陵又有明显改变，这与上文所述帝陵陪葬墓分布的四个发展阶段既有差别，也有较多相似之处，反映出综合发展的同时，中陵园与陪葬墓分布之间也存在着关联。中陵园东西与南北长度的具体比例，尤其是西汉中晚期比例的变化，又较好体现出陪葬墓分布及中陵园发展具有渐进性，并最终在康陵时完成转变。

陪葬墓位置与分布及中陵园的发展也较好体现出帝陵方向的发展与变化。相关研究以陪葬墓为参考内容之一，或认为西汉帝陵的方向是二元甚至是多元的，南北向为主要方向，东西向为次要方向^[30]；或指出西汉帝陵的外陵园和墓葬朝向整体上呈现出由东变南，东、南杂糅的发展脉络^[31]。笔者较赞同后者。西汉帝陵方向或朝向发展变化较明显体现在陪葬墓从中陵园一侧发展为多侧并最终确定以南侧为主，中陵园平面形状发展经由东西向长方形转变为南北向长方形，中陵园外南侧正式成为外陵园中最重要的位置等方面。平帝康陵在西汉末年完成了坐北面南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完成既与西汉末年社会政治有关，如王莽时期续建康陵未完的工程^[32]，也是西汉晚期中陵园外南侧位置重要性得到极大增强的发展结果。

东汉帝陵的墓道南向且重要性突出，许多下葬时的葬仪皆围绕墓道展开，陵寝“坐北朝南”埋葬礼俗的确认，无疑是对秦至西汉时期“坐西朝东”葬俗的根本性变革^[33]。该制度的形成应有来源，西汉晚期帝陵中陵园外南侧位置重要性得到逐步提高即原因之一，而陪葬墓的分布则很好体现了这一点。而康陵时，西汉帝陵初步完成了由“坐西面东”向“坐北面南”的转变，当是对东汉帝陵“坐北面南”最重要或是最核心的影响因

素之一。

五、结 语

西汉时期，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帝陵相关制度、内涵等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陪葬墓即是较为重要的组成内容之一。与丧葬礼仪、等级制度、君臣关系等多种内容相结合，绝大多数西汉帝陵会在中陵园之外相应方位设置陪葬墓区。整体来看，西汉帝陵陪葬墓的位置与分布具有多样性，中陵园外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皆有分布，但因所处时代的差异、皇位继承背景的不同、具体帝陵的差别及不同阶段的社会特征等因素，陪葬墓的位置与分布呈现出继承与发展并行、相似与差异并存的特征。在时代相邻的帝陵中，时代较晚的帝陵继承特征明显，而在发展过程中，帝陵陪葬墓由稍早阶段的仅一侧集中分布发展为多侧分布，并由东侧集中分布发展为南侧为主要分布区，而多个方位均有陪葬墓分布的情况下又在陪葬墓数量上存在差别，这些都体现出陪葬墓分布方面存在的主次之分。

西汉帝陵陪葬墓的内容、内涵较为丰富，其位置与分布不仅较好反映出不同等级、不同性质甚至不同时期的人员陪葬帝陵的制度及与之有关的陵区规划、设计和相关礼仪、制度等内容，有效展现出皇权至尊性及中央集权制度等方面的内涵与特征，也从多个方面体现出陪葬墓与西汉帝陵其他组成内容的关系，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西汉帝陵制度的发展、演进和转变，并为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西汉帝陵陪葬墓在汉代陵寝制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总而言之，陪葬墓的位置和分布从一个方面较好体现出西汉帝陵陵寝内容及其制度的发展、演进特征，因此可视为研究汉代陵

寝制度的一个重要视角。

- [1] 焦南峰. 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 考古, 2007, (11).
- [2] 曹龙. 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 西安: 西北大学, 2009.
- [3] 刘瑞. 秦、西汉帝陵的内、中、外三重陵园制度初探. 中国文物报, 2007-05-18 (07).
- [4] 焦南峰. 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的分析与推定. 考古与文物, 2013, (5).
- [5]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11~17.
- [6] 同[5]: 24~26.
- [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汉文帝霸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22, (3).
- [8] a. 王丕中, 张子波, 孙德润. 汉景帝阳陵调查报告. 考古与文物, 1980, (1).
b.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 1996年—1998年. 文博, 1999, (6).
c.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汉阳陵.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1~11.
- [9] 焦南峰, 杨武站, 曹龙. 神道、徽道、司马门道: 西汉帝陵道路初探. 文物, 2008, (12).
- [10] a.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兴平县茂陵勘查. 考古, 1964, (2).
b.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报告. 考古与文物, 2007, (6).
c.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茂陵博物馆. 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11, (2).
d. 咸阳地区文管会, 茂陵博物馆. 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 文物, 1982, (9).
- [11]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汉昭帝平陵钻探调查报告. 考古与文物, 2007, (5).
-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汉宣帝杜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21, (1).
-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考古, 2013, (11).
- [14] a.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汉成帝延陵考古勘探调查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19, (4).
b.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成帝延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9: 26~28, 160~175, 249~255.
- [15] 同[11].
-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哀帝义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12, (5).
- [17] 刘庆柱, 李毓芳. 西汉十一陵.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210.
- [1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平帝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文物, 2014, (6).
- [19] 班固. 撰. 汉书: 成帝纪.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317.
- [20] 班固. 撰. 汉书: 李广传. 颜师古, 注. 前揭书: 2449.
- [21] 同[9].
- [22] a. 焦南峰. 西汉帝陵“夫人”葬制初探. 考古, 2014, (1).
b. 同[3].
- [23] 秦中行. 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 文物, 1972, (7).
- [24] 同[3].
- [25] 同[2]: 15~18, 36.
- [26] 同[14] a.
- [27] 霸陵及有关帝陵中陵园的长宽比是根据原发掘简报中的数据计算所得, 而渭陵、义陵的调查与勘探简报对阳陵、茂陵中陵园的长宽比也有分析, 见注释[13]、[16]。
- [28] 同[14] a.
- [29] a. 同[13].
b. 同[16].
- [30] 刘卫鹏. 试论西汉帝陵的方向 //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2015.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36~147.
- [31] 朱晨露, 赵钧陶. 西汉帝陵朝向新探.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
- [32] 同[18].
- [33] 韩国河. 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 考古与文物, 2007, (5).

(责任编辑: 魏佳佳)